

#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扫描:2014

唐仕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要]2014年度,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亦有突破理论、视角瓶颈的反思与探索。电子资料的海量增加,统计、调查资料的涌现,社会史研究中引入大数据分析与研究模式值得期待。市政建设、城市空间、城市建筑等方面研究成果比较突出。社会治理受到关注。近代精英思想与大众文化的交融和互动,生活方式变迁取得新进展。社会结构、社会治理、慈善、灾荒史等领域需要拓展研究视角。医疗、卫生、环境史以及公众史学、新文化史、历史记忆等领域的实证研究有待深化。

[关键词]近代中国;社会史;研究综述

[作者简介]唐仕春(1973—),男,四川省开江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法律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5)05-0050-06 [收稿日期]2015-04-20

2014年,国内外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仍然延续近年来兴旺发展势头,取得一批新成果,出现了一些较受关注的热点问题。

## 一、社会史理论与方法

20世纪最后三十年,国际史学界兴起了公众史学,也存在从社会史向新文化史转向。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公众史学、新文化史、历史记忆等领域的理论探讨逐渐增多,这些理论探讨多从域外着眼,有的缘起于社会史研究,有的直接关系到社会史研究。2014年度的特色之处在于,有些学者从本土资源探索社会文化史理论取得了可喜进展。刘志琴指出,社会文化史研究对于历史悠久、积累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来说,更具有本土特色和发展的优势。传统中国为礼俗社会,礼与俗分处于国家与民间的不同层次。礼俗整合的后果使得礼中有俗,俗中有礼,礼和俗相互依存,双向地增强了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礼俗互动是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特色<sup>[1]</sup>。梁景和认为,生活质量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一个新维度。客观生活质量主要指社会生活条件的实际状况,而主观生活质量指的是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研究生活质量有着诸多研究方法,在运用上是多维交叉同步进行的<sup>[2]</sup>。

计量史学在世界史学潮流中曾盛极一时,而今时过境迁,风光不再。旧理论、旧方法、旧领域虽不在潮头浪尖,却往往不能退出历史研究的舞台。近年随着新史料尤其电子资料的大量涌现,运用计量方法针对

中国问题,尤其是社会史问题展开研究具备了越来越大的可能性。梁晨、李中清以学籍卡材料为中心讨论了大数据、新史实与理论演进。他们指出,学籍卡似的格式化、系统性历史文献成为构建大型计量历史数据库的重要资源;这些计量历史数据库往往能向学者展现出依靠传统文献分析方法难以显现的“新史实”;这些“新史实”不仅对填补或纠正过往的历史认知颇有裨益,甚至还能有效地推动学术理论的演进与革新<sup>[3]</sup>。

## 二、家族、群体与社团

对社会结构的研究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多的家族、群体、社团个案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其研究取向或者探讨群体与团体内部结构及变迁,或者将其放入诸如国家与社会之类的解释框架中予以分析。池子华指出,社会网络或者说社会资本,在“长三角”地区的近代打工妹求职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用人单位根据职业的性质寻求打工妹的“职求”路径,同样不能小视<sup>[4]</sup>。高纲博文《近代上海日侨社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讨论了上海日本居留民社会、“上海事变”与日本居留民、日中战争时期的“上海租界问题”等,试图阐明日本人在上海的具体活动及其意识状态。

国家与社会框架往往衍生出群体、团体与地方社会、各级政府、国民党、共产党之间的互动。许冠亭的研究表明,社团与国民党党部之间存在张力。1934年,苏州光裕社与男女说书会因苏州弹词男女搭档演出形式引发冲突。冲突双方没有诉诸司法机构,而是依次

向国民党各级党部呈请裁决。许冠亭指出,中央党部的终裁允许社团分立、禁止男女拼档,但社团迅速分立而男女拼档却有禁无止;后来男女拼档成为主要演出形式,社团复归统一,竟与终裁方案完全相反<sup>[5]</sup>。何友良则指出了苏区社团与中共政权之间的和谐关系,即苏区政权通过主动转移一部分权力和职能,使社团成为有限权能分担的社会共同体,与乡村政权互为依存和补充,在动员组织民众、变革社会结构、建立新意识形态和人民对国家权力的认同、实现民众利益与乡村治理的宏大目标中发挥作用<sup>[6]</sup>。彭南生注意到了1921年上海商界总联合会分裂原因的复杂性。他认为,政见的分歧是双方对立的基本原因,权力争夺是彼此角力的关键因素,商界内部的派系矛盾则是新、旧两总会摊牌的重要推手,在政争、权争与派系之争的背后,既掺杂着宁波帮与非宁波帮之间复杂的地缘因素,也存在着内部制度设计不合理、商联会成员社会成分复杂等组织缺陷<sup>[7]</sup>。

性别视角是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分析角度,最早由西方引入,后经过了本土化的改造。本年度一些论著从性别的视角呈现了近代中国社会中女性的某些面相。

有学者分析了战争、政治、司法中的女性。陈雁《性别与战争:上海1932—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从性别角度重新审视中日战争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对中国女性的影响,试图呈现出当时上海妇女对于战争的体验、记忆,对“民族国家”的历史和话语的感受。李木兰《性别、政治与民主:近代中国的妇女参政》(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认为,近代中国女性精英倡导的妇女参政运动,创造了一个新的空间,使得男性和女性道德的性别规范在这一空间急剧转型。张念《性别政治与国家:论中国妇女解放》(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一书,揭示出中国妇女解放过程中的种种矛盾与悖论,主要讨论了国家理论中的性别、女性解放的道德与政治冲突、革命政治与性别伦理、性别平等与政治正当性、自由的性别实践等问题。杨杨梅指出,中共的反缠足运动既延续了自晚清以来的政治化思路,又不断根据新形势赋予缠足各种内涵<sup>[8]</sup>。杜正贞从龙泉司法档案的供词、笔录中观察到女性自己站在了公堂法庭之上,直接面对知县、法官以及对方,并发声说话,同时她又指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供词和笔录如实记录了女性当事人真实的语言及诉求,专业化的司法程序、法律语言,使男权以微妙的形式继续潜藏于诉讼过程中<sup>[9]</sup>。

日常生活和文化教育中的女性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小田讨论了江南乡村女巫的近代境遇,认为这一

境遇有两个层面:一是不断遭遇政权的取缔又屡禁不止;二是得到了普通民众的积极崇奉。这种矛盾的境遇源自传统小世界和文明大世界的个别逻辑<sup>[10]</sup>。秦方则以晚清出现的新词汇“女界”为切入点,探讨近代中国女性在国家民族话语、男女性别关系和中国传统精英文化等脉络互动中形成的身份建构与认同<sup>[11]</sup>。

### 三、城市与乡村社会

近年来,城市史一直是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热门领域。2014年度,市政建设、城市空间、城市建筑等方面研究成果尤为突出。董玥《民国北京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一书,考察了民国时期北京的空间变迁、日常物质生活及其文化表述。王煦《旧都新造:民国时期北平市政建设研究(1928—1937)》(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指出,民国迁都以后的北平市政建设,是在多种社会力量和多元利益群体互动博弈、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是传统与现代城市元素既对立矛盾又融合开新的过程。董佳《民国首都南京的营造政治与现代想象(192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梳理了1927—1937年南京城市现代化受政治和权力影响的复杂性。万勇《近代上海都市之心:近代上海公共租界中区的功能与形态演进》(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则以相关历史地图和历史图片为基础,分别对公共租界中区的城市功能、住宅布局、空间形态、道路桥梁、市政水系等空间元素的历史变迁进行阐述,反映了外滩地区空间形态的来龙去脉及其缘由。此外,洪煜、刘永广以1929年无锡拆城筑路事件中的报刊舆论冲突为例探讨了近代地方城市建设中的困境<sup>[12]</sup>;牟振宇运用《申报》资料分析了近代上海官方、民众、士绅与外国人在风水问题上的冲突与纠葛<sup>[13]</sup>,都较有新意。

有关乡村社会的研究成果,亦颇为引入瞩目。罗威廉《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细致描述了从元朝末年到抗战初期麻城县经历的种种暴力事件,从地理环境、政治文化、阶级结构等方面探讨了暴力的社会生态,其写法既继承年鉴学派探讨长程社会变迁的优良传统,又借鉴了新文化史注重意义解读和故事讲述的研究取向,既有对大众文化和集体记忆的精彩论述,又有对国家与社会框架的重新检视。张俊峰认为,清至民国时期山西水利社会中的水权交易行为相当普遍且类型多样,这不仅是水资源紧缺状态下山西民众智慧的结晶,也是调解水资源时空配置不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的一种特有方式<sup>[14]</sup>。

近年来,交通社会史,尤其交通对城乡的影响成果

初显 2014 年度强化了这一趋势。江沛、陈夏琼指出,京汉铁路通车刺激了漯河运输业、农业产业化和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并逐步实现了由传统农业与贸易依附向现代工商业的转型;带动了漯河城市规模和空间的持续膨胀,逐步发展成为物资集散地,并奠定了豫中南部地区水陆交通枢纽的地位<sup>[15]</sup>。任放认为,晚清以降两湖地区的新式交通工具成为近代工商实业能否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不可忽视的是,传统的交通工具并未退出历史舞台,而是与轮船等新式交通相契合,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交通格局<sup>[16]</sup>。吴明罡则分析了近代东北西部的铁路建设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sup>[17]</sup>。

#### 四、社会秩序与社会治理

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建设对基层社会的影响力、控制力越来越大。2014 年度的一些研究成果对此作了较好诠释。梁勇《移民、国家与地方权势——以清代巴县为例》(中华书局 2014 年版)一书讨论了一个具有移民社会特色的地方基层管理体制的演变过程,并通过保甲制度、啮嚙、客长、团正、学董、八省会馆等探讨了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权在基层治理上的互动情况。

长期以来,北洋时期历史被建构成为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丧权辱国的黑暗年代。近年来,学术界关于北洋时期的历史书写已悄然改变。北洋时期的社会秩序与社会治理也逐渐引起学者的重视。唐仕春《北洋时期的基层司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版)一书从社会史视角探讨了司法独立理念与共和观念,收回法权运动与政治分立,司法经费与人才,以及诉讼状况等因素在不同历史情境下形成不同的组合模式,推动或制约司法与行政的分立。该书着力于史事重建,使言说的界限建立在数量概念之上。

丰箫《权力与制衡:浙江省嘉兴地区乡镇自治研究:1945—1949》(商务印书馆 2014 年版)一书将乡镇自治研究置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框架下,而非官治与自治、绅权与民意的简单对立;将国家与乡村社会视为两个互为影响和制约的主体,而不是主动与被动、控制与被控制绝对对立的关系。邢照华指出,20 世纪前期广州社会纠纷调控中政府与民间组织在纠纷应对中显示出了一定的互补性,但调解本身仍然呈现出无序化和多方博弈的特征<sup>[18]</sup>。朱煜指出,1928—1937 年江苏省民众教育馆在协调与基层民众以及地方政府关系时颇能如鱼得水,某种程度上充当了官方代理人 and 民间社会组织者的双重角色,一定程度上疏通了已经淤塞的基层政治轨道<sup>[19]</sup>。

#### 五、生活、习俗与社会文化

经过二十多年的提倡、摸索,中国本土的社会文化

史研究成效显著。2014 年度,有些学者继续沿着社会与文化互动的路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绩。李长莉探讨了“洋货流行”与消费风气转变的关系,即晚清开口通商后,“洋货”开始大批输入并逐渐流行,引起人们消费风气的演变,从被国人视为有害道德的炫耀性消费风气,到形成流行时尚性消费风气,直至洋货进入日常生活一般消费品领域,形成实用性消费风气<sup>[20]</sup>。陈细晶以上海《立报》为例,分析了 1930 年代商业、战争与公众阅读之间的复杂关系,指出战争危机刺激了公众的民族主义情绪,《立报》出于政治化阅读和商业利益的需求,变革了原有的报纸风格<sup>[21]</sup>。罗检秋则讨论了家学传衍与乾嘉汉学转变的关系<sup>[22]</sup>。

近代以来新的生活方式、文化教育改革颇受学者关注。2014 年度,学术界主要讨论了民国春节存废、民国历史教科书、上海“日光节约”运动,以及唱片等对民众生活造成的复杂影响。

民国时期社会上围绕过哪个新年、春节存废等问题产生了广泛争论,最终政府实行了废除春节的政策,并以失败告终。忻平、张坤指出,新年之争客观上传播了现代文明的要素,推动了传统节日习俗的现代转型。废除春节政策的失败,启示我们在改造、改良习俗的过程中应尊重生活的逻辑,采用渐进的方法,尤其要处理好习俗变迁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sup>[23]</sup>。

刘超以“清朝史”叙述为中心讨论了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他指出,民国教科书对清朝统治持批判态度:北京政府时期主要从“共和”立场批判清朝专制统治;南京政府时期从汉族立场批判清王朝的民族压迫。北京政府时期的“共和”立场与民初共和政体相关,南京政府时期的汉族立场受国民党国体制的影响<sup>[24]</sup>。

李玉对 1940 年代上海的“日光节约”运动作了探讨。他认为,此项运动的经济效应虽然并不明显,却不失行政功用与文化意义;实际推行过程中,此制给民众带来的困扰也是明显的,有些行业甚至未蒙其利,实受其害<sup>[25]</sup>。

葛涛则梳理了唱片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他认为,唱片改变了人们的听戏方式,对于名角名段名歌的普及与都市的流行文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唱片推动了各种地方曲艺的传播与交流,丰富了都市居民的文化生活;唱片在国语与外语教学领域的使用,对教育改革有促进意义;唱片录制的内容被用于法庭的证词,增加了证词的种类,有利于司法工作的开展<sup>[26]</sup>。

学术界对民间信仰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新成果。郁喆隽《神明与市民:民国时期上海地区迎神赛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 2014 年版)一书,着重分析了城隍

庙三巡会、浦东赛会与江湾镇东岳庙赛会等典型案例中的组织、人员、财政状况及其引发的冲突。朱季康《近代华东民间秘密互助团体太谷学派的生存与信仰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通过考察近代民间秘密互助团体太谷学派生存历史及信仰体系,从一个侧面展示了近代儒、释、道在民间的蓬勃活力及其变异。路云亭《义和团的社会表演——1887—1902年间华北地区的戏巫活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采用“社会表演”理论,分析了义和团的集体性格,阐释了义和团与红灯照成员的各种社会表演活动,对义和团戏剧性格的生发原因、义和团与巫术的关系等论题作出了富有新意的解读。此外,李俊领探讨了近代北京的四大门信仰,揭示了四大门信仰及其代理人与碧霞元君信仰的关系,并提出四大门信仰习俗不是宗教的看法<sup>[27]</sup>。徐天基勾勒了1696—1937年北京丫髻山进香的变迁史,旨在用个案形式反思并回应华琛等人开创的“标准化”议题<sup>[28]</sup>。康豹则讨论了1898—1948年间中国浙江省和上海地区传统宗教如何蜕变成现代全球文化之一部分的历程,并借此透视了宗教与现代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sup>[29]</sup>。

## 六、医疗、卫生、环境与慈善救济

近年,医疗、卫生和环境史的研究逐渐升温。

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和完善是在晚清至民国期间。既往研究大多立足于“传入”与“接受”相互对应的层面。高晞着重由官方角度考察这一过程,认为中国西医知识体系的确立是卫生政治化的过程<sup>[30]</sup>。刘希洋、余新忠以福建螺江陈氏家族为例,分析了家族的病因认识、疾病应对与病患叙事<sup>[31]</sup>。杜丽红指出,清末民初,北京的疫病防治经历了较大转变,这不仅得益于为应对疫情设立各类防治机构,而且得益于日常性疫病防治机制的设立<sup>[32]</sup>。罗振宇指出,从1870年设立兼职卫生官,到1898年专职卫生官和卫生管理机构的出现,上海工部局的医疗服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仅关注雇员健康到关注公共医疗的过程,体现出了从“救己”到“救人”的转变<sup>[33]</sup>。任吉东、原惠群从中国传统的粪业经营及观念入手,论述了西方列强在传播近代公共卫生的过程中对便溺惯习实施的“暴力”化治理和对传统粪业体系的规范化管理,诠释了卫生普及背后西方文明的传播方式和路径<sup>[34]</sup>。

2014年度《江汉论坛》刊载了一组中国环境史研

究的文章,以介绍研究动态,进行理论探讨为主<sup>①</sup>。当前国内环境史研究常常忽视了其中的文化维度。有鉴于此,余新忠主要从疾病与健康的角度探究了缺失文化维度的缘由、文化研究的意义和内容等问题<sup>[35]</sup>。相关实证研究也取得一些成绩。罗晓翔对明清南京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作了考察,他认为,明清时期,随着城市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南京内河水环境不断恶化,秦淮河道淤塞与水质污染日趋严重。在南京,其治河主持机构的行政级别较高,治河经费也相对充裕,只在清代嘉庆、道光时期曾大量动用民间捐款。由于治理方式的局限,历次治水工程皆无法取得长效,亦不能遏止水环境恶化的趋势<sup>[36]</sup>。

自19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有关灾荒史的研究,逐渐由涓滴发展为一股颇具规模的潮流。而目前最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研究思路和框架的重复。基于此,《史学月刊》刊发了“灾荒史研究的新视域”的笔谈,主旨在对以往研究模式的方法论基础进行深入反思,力图开拓灾荒史研究的新视域,以推动其向集约型方向发展<sup>②</sup>。

本年度慈善救济研究主要围绕国家与民间之间的关系而展开。一些学者认为,国家政权加强了对民间社会的控制,导致民间社会与国家政权的疏离、矛盾。李德英、冯帆以清末四川新津县社济仓为例指出,社仓经首大多是代替地方政府行使管理仓储的职责,其自主权力减少。同时,社仓经首与粮户之间、新旧社仓经首之间的矛盾也愈演愈烈,导致越来越多的地方士绅纷纷推诿,不愿担任此职。晚清时期新津县国家控制仓储的能力加强,而地方士绅参与地方事务的兴趣却呈现出减弱的趋势<sup>[37]</sup>。1927年,盛宣怀子女违背庄规分析家族愚斋义庄财产引发纠纷,江苏省政府企图乘机将善产据为己有,但在中央政府的干预下,善产最终被中央政府收入囊中,义庄随之寿终正寝。王志龙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改变了自北宋以来政府通过监督保护实现义庄自主经管和发展的一贯政策,以保护之名行掌控之实,对义庄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sup>[38]</sup>。

国家与社会视角下,不仅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也有学者从不同案例探讨民间组织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阮清华指出,在近代上海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各善会善堂不断整合,形成了一些大型慈善组织,从组织结构、慈善活动和资金扶持等方面织成了一张巨大

① 参见《江汉论坛》2014年第5期濮德培《中国环境史研究现状及趋势》、穆盛博《中国环境史研究的新趋势》、谢健《新清史与中国环境史前沿》、韩昭庆《历史地理学与环境史研究》、陈颖佳《纵览世界、跨越藩篱:浅谈耶鲁大学的环境史研究》。

② 参见《史学月刊》2014年第4期余新忠《文化史视野下的中国灾荒研究议》、高国荣《环境史视野下的灾害史研究——以有关美国大平原农业开发的相关著述为例》、安特利亚·扬库《国际人道主义在中国:从20世纪初的灾赈谈起》、朱洪《食为民天:清代备荒仓储的政策演变与结构转换》。

的社会网络。慈善网络使民间社会发挥出了巨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能力<sup>[39]</sup>。清代科举宾兴是一种主要由民间捐资设立的教育公益基金,它利用田产、银钱、店房等资产的增值收入,无偿资助本地士子参加各级科举考试。毛晓阳、金甦指出,清代科举宾兴逐渐形成了相互结合、互为补充的基层社会监督机制,其内容主要包括立碑、入志、编纂宾兴专志、刊印宾兴征信录及宾兴簿册等。这些监督方式与政府立案管理制度一起,共同构成了清代宾兴社会公益活动的外部监管机制<sup>[40]</sup>。

## 七、问题与反思

本年度社会史研究在上述领域取得的成果推进了对相关历史的认识,不过也存在一些需要反思的问题,并出现一些寻求改进与拓展的路径。

积极拓展新视角。当今社会史研究中运用较多的有现代化视角、国家与社会视角等。如在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研究对象无论是家族、群体与社团,还是市政建设,无论是社会治理还是卫生慈善,研究者常常着眼于揭示群体、团体、地方精英、民间社会、各级政府、党派等各种力量之间的权力格局与互动。一些论著的新意不在于从个案中为国家与社会关系增添新的模式,而在于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既有模式找到了新的个案、新的注脚。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拓展离不开研究视角的转换,循此发现了历史研究的新对象,认识了历史的新面相。本年度灾荒史、环境史、社会文化史等领域突破理论、视角瓶颈的反思与探索,表明一些学者已经不满研究现状,正在拓展新视角,这将有利于引领社会史研究迈上更高的台阶。

推进新旧视角下的实证研究。近年中国学术界对环境史、医疗卫生、公众史学、新文化史、历史记忆等领域的理论探讨逐渐增多。不过,这些新领域、新视角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正如中国大陆学术界的近代环境史研究,引进了西方环境史论述,呼吁加强中国的环境史研究,往往多于实证研究。新视角的学术价值需要通过一定数量的实证研究来展示,否则,新视角即便成为学术界热点,也难以以为学术界作出更多更大的真正贡献。同时,一些并不新的视角与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也需要实证研究。如电子资料的海量增加,统计、调查资料的涌现,使言说建立在数量概念之上成为可能。世界史学潮流中不再时髦的量化研究在中国史学中远远未能穷尽其解释力,社会史研究中还需引入社会科学化的大数据分析与研究模式。2014年度无论是围绕学籍卡材料展开的讨论,还是在基层司法研究中重建史实的努力,都可以看到沿用传统方法的实证研究的

巨大空间和可能性。

## [参考文献]

- [1]刘志琴. 从本土资源建树社会文化史理论[J]. 近代史研究 2014(4).
- [2]梁景和. 生活质量: 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维度[J]. 近代史研究 2014(4).
- [3]梁晨, 李中清. 大数据、新史实与理论演进——以学籍卡材料的史料价值与研究方法为中心的讨论[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5).
- [4]池子华. 近代长三角地区打工妹就业路径探析[J]. 江苏社会科学 2014(2).
- [5]许冠亭. 党治体制下的社团冲突与社团管理——以1934年苏州弹词男女拼档纠纷案为例[J]. 近代史研究 2014(3).
- [6]何友良. 权能分担与社会整合——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苏区社团[J]. 近代史研究 2014(3).
- [7]彭南生. 政争、权争与派系之争: 上海商总联合会分裂原因初探[J]. 史学月刊 2014(8).
- [8]杨杨梅. 中共根据地反缠足依据的演变(1928—1949)[J]. 社会科学研究 2014(1).
- [9]杜正贞. 晚清民国庭审中的女性——以龙泉司法档案供词、笔录为中心的研究[J]. 文史哲 2014(3).
- [10]小田. 论江南乡村女巫的近代境遇[J]. 近代史研究 2014(5).
- [11]秦方. 新词汇、新世界: 清末民初“女界”一词探析[J]. 清史研究 2014(4).
- [12]洪煜, 刘永广. 近代地方城市建设中的困境——以1929年无锡拆城筑路事件中的报刊舆论冲突为例[J]. 史学月刊, 2014(12).
- [13]牟振宇. 近代上海城市化过程中的风水事件——以《申报》为中心(1872—1900年)[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
- [14]张俊峰. 清至民国山西水利社会中的公私水交易——以新发现的水契和水碑为中心[J]. 近代史研究 2014(5).
- [15]江沛, 陈夏琼. 京汉铁路与近代漯河城市的初兴[J]. 中州学刊 2014(2).
- [16]任放. 近代两湖地区的交通格局[J]. 史学月刊 2014(2).
- [17]吴明罡. 近代东北西部的铁路建设对区域社会经济的影响[J]. 社会科学战线 2014(5).
- [18]邢照华. 20世纪前期广州社会纠纷调控考察[J]. 史学月刊 2014(8).
- [19]朱煜. 民众教育馆与基层政权建设——以1928—1937年江苏省为中心[J]. 近代史研究 2014(3).
- [20]李长莉. 晚清“洋货流行”与消费风气演变[J]. 历史教学, 2014(2).
- [21]Sei Jeong Chin. “Print Capitalism, War,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Mass Media in 1930s China”, *Modern China*, July 2014.
- [22]罗检秋. 家学传衍与乾嘉汉学的转变[J].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2).

- [23] 忻平 张坤. 政俗关系视野下的民国“新年”之争——以《申报》为中心[J]. 江苏社会科学 2014(2).
- [24] 刘超. 民国历史教科书中的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以“清朝史”叙述为中心[J]. 学术月刊 2014(3).
- [25] 李玉. 1940年代上海“日光节约”运动研究[J]. 南京社会科学 2014(2).
- [26] 葛涛. 略论唱片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J]. 史林 2014(4).
- [27] 李俊领. 近代北京的四大门信仰三题[J]. 民俗研究 2014(1).
- [28] 徐天基. “标准化”的帷幕之下: 北京丫髻山的进香史(1696—1937)[J].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84期 2014年6月.
- [29] Paul R. Katz. Religion i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4.
- [30] 高晞. 卫生之道与卫生政治化——20世纪中国西医体系的确立与演变(1900—1949)[J]. 史林 2014(5).
- [31] 刘希洋 余新忠. 新文化史视野下家族的病因认识、疾病应对与病患叙事——以福建螺江陈氏家族为例[J]. 安徽史学 2014(3).
- [32] 杜丽红. 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J]. 史学月刊, 2014(3).
- [33] 罗振宇. “救己”到“救人”: 工部局早期医疗服务与城市公共医疗的起源(1854—1898)[J]. 江苏社会科学 2014(3).
- [34] 任吉东 原惠群. 卫生话语下的城市粪溺问题——以近代天津为例[J]. 福建论坛 2014(3).
- [35] 余新忠. 浅议生态史研究中的文化维度——基于疾病与健康议题的思考[J]. 史学理论研究 2014(2).
- [36] 罗晓翔. 明清南京内河水环境及其治理[J]. 历史研究, 2014(4).
- [37] 李德英 冯帆. 清末社仓经首选任与乡村社会——以四川新津县社济仓为例[J]. 四川大学学报 2014(4).
- [38] 王志龙. 愚斋义庄案中的政府与民间慈善组织[J]. 南京社会科学 2014(9).
- [39] 阮清华. 试论近代上海民间慈善事业的网络化发展[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2014(1).
- [40] 毛晓阳 金甦. 论清代社会公益组织的基层社会监督机制——以科举宾兴为中心[J]. 东南学术 2014(3).

## Studies on China's Modern History in the Year of 2014

TANG Shi - chun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a's Modern Histor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6, China*)

**Abstract:** In 2014 great results were made in the studies on China's modern history including theoretical breakthrough, reflections on bottleneck and exploration. There were more e - data, statistics and questionnaire.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big data analytics was introduced into the researches of social history. Researches results of urban construction, space and architecture are prominent; social treatments are cared very much; new developments were made in the field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lite ideas and popular culture, living style and so on. Social structure, charity, famine history and so on should be researched from more angles. Histories of medical care, environment, public history, new culture and so on should be deepened further.

**Key Words:** modern China; social history; research review

[责任编辑、校对: 把增强]